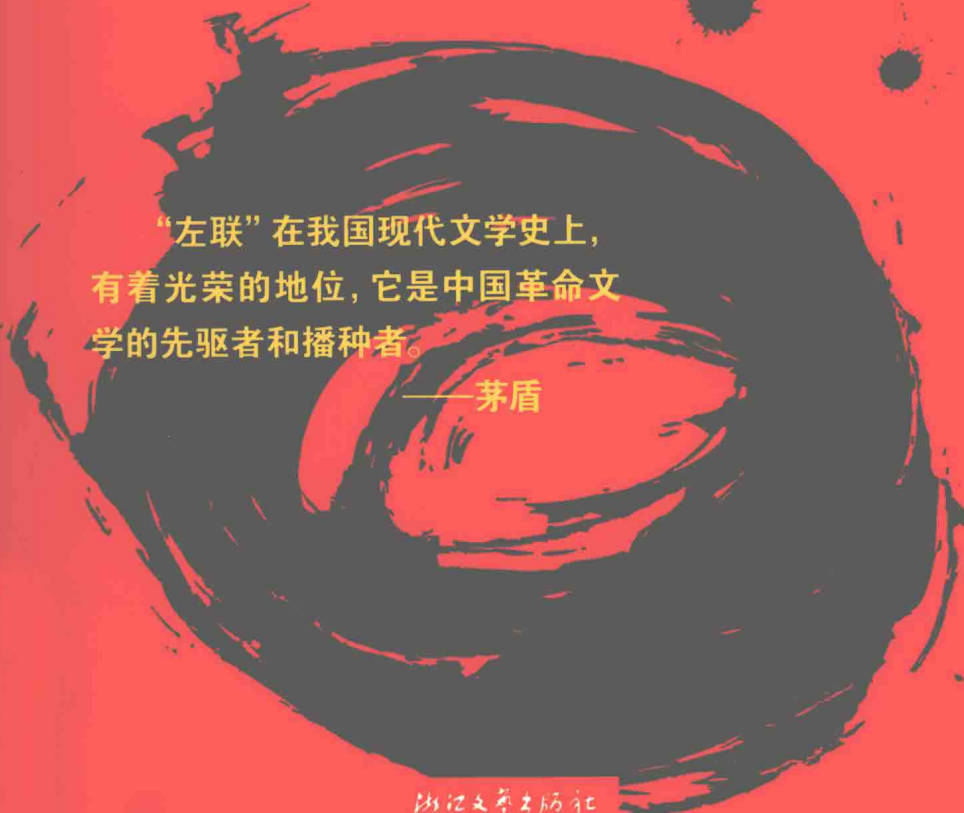


左联之鹰

姚辛 / 著



“左联”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，
有着光荣的地位，它是中国革命文
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。

——茅盾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左联之鹰

姚辛 /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左联之鹰 / 姚辛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1.6

ISBN 978-7-5339-3205-3

I. ①左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—史料 IV. ①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4262 号

责任编辑 楼文英

封面设计 水墨

责任校对 陈玲

左联之鹰

姚辛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349 千

印张 11.75

插页 2

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205-3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“鹰巢”灿烂——左联概述	1
郭沫若	24
茅 盾	37
潘汉年	57
杜国庠	61
洪 深	64
白 薇	70
郑伯奇	77
郁达夫	79
萧 三	86
陶晶孙	91
田 汉和安 娥	96
杨 潮和杨 刚	105
穆木天和彭 慧	111
魏金枝	116
夏 衍	118

巴 人	127
胡 风和梅 志	134
冯润璋	145
冯雪峰	146
聂绀弩	152
夏征农	160
丁 玲	166
张秀中	172
高敏夫	174
王余杞	179
王志之	181
楼适夷	184
林淡秋	191
孙席珍	195
石凌鹤	198
周 文和郑育之	204

关 露	211
廖沫沙	214
尹 庚	220
欧阳山和草 明	224
李正文	230
石 灵	233
伍石夫	236
叶 紫	239
高云览	246
徐懋庸	252
吴 强	256
金 丁	259
庄启东	263
叶以群	265
雷石榆	272
孟 昌	280

张天虚	283
端木蕻良	287
陈 沂	291
唐 瑜	294
饶彰风	301
方 殷	308
陈企霞	314
谷景生	320
李之珽	326
王西彦	331
周而复	337
梅 益	345
陈辛仁	351
黄新波	356
田 间	360
赵俪生	368

“鹰巢”灿烂

——左联概述

—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大屠杀以后，反动派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浸入血泊之中，白色恐怖弥漫大地。面对黑暗、暴虐，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愿遁入书斋，不愿明哲保身、与世无争，相反，他们纷纷结社，出版刊物，宣传民主自由，鼓舞民众追求光明幸福。以郭沫若、冯乃超、郑伯奇等为首的后期创造社，革新《创造月刊》，创办《文化批判》《流沙》《畸形》《思想月刊》等杂志，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，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；从1928年元旦起，以蒋光慈、钱杏邨、孟超等为首的太阳社，先后出版《太阳月刊》《海风周报》《新流月报》《拓荒者》等刊物；以洪灵菲、林伯修（杜国庠）、戴平万等为首的我们社，鲁迅、柔石、王方仁、雀真吾的朝花社也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宣传、大倡导的洪流；鲁迅、郁达夫编辑的《奔流》，鲁迅、冯雪峰编辑的《萌芽月刊》和《新地月刊》，鲁迅编辑的《文艺研究》，郁达夫、夏莱蒂编辑的《大众文艺》，引擎社的《引擎》等刊物也先后问世。文坛学界百花绚丽，守旧的“三民主义文学”退避三舍，哑然失声！

1929年10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创造社、太阳社、我们社和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等社团联合起来，结成文艺界的统一组织。地下党还把沈端先（夏衍）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抽调来参与领导这一工作；嗣后，刚从国外归来的吴黎平也加入进来，共同从事筹备工作。其间，沈端先、冯乃超曾趋府拜访鲁迅先生，根据地下党指示征询先生意见，新组织的名称，“左翼”二字是否要加。鲁迅明确认为，还是加“左翼”二字

为好,这样可以是非分明、阵线分明。于是“左翼”二字被采用,新团体之名定为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,简称“左联”。

1930年2月24日,沈端先、冯乃超再次拜访鲁迅,商议左联纲领、联盟成员、组织机构,以及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等事项。

2月26日,根据党的指示,左联筹备小组的十二位成员即鲁迅、柔石、冯雪峰、郑伯奇、冯乃超、彭康、华汉(阳翰笙)、阿英(钱杏邨)、蒋光慈、洪灵菲、夏衍、戴平万和筹备工作领导人潘汉年等,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公啡咖啡馆二楼举行座谈会,围绕“清算过去”及“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”进行讨论。大家认为,在过去一年半的新兴文艺运动中存在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;批判不正确,还不能用科学的批评态度及方法;批判过于对准自己营垒的人和事,反而放过了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封建思想;忘记了文学的任务是助进政治运动,成为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服务的文学运动。确定今后的任务是:一、严厉地破坏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;二、宣传新社会的理论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;三、建立新的文艺理论。最后,“全场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,共同运动的必要”。

大家分头去联络各种有必要有可能加入左联的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、文学翻译家、文学评论家、画家等,成绩可观。鲁迅提出,左联应当团结名作家郁达夫,吸收他成为联盟的发起人,这个提议为大家所接受并付诸执行。

二

1930年3月2日下午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虹口宴乐安路(今多伦路)中华艺术大学举行,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潘汉年、鲁迅、冯乃超、华汉、龚冰庐、孟超、莞尔、丘韵铎、夏衍、周全平、洪灵菲、戴平万、阿英、冯雪峰、黄素、郑伯奇、田汉、陶晶孙、彭康、朱镜我、柔石、殷夫、许峨、冯铿、林伯修、王一榴、叶沉、冯宪章、许幸之、俞怀、王洁予、冯润璋、王任叔、鲁史、吴贯中、刘锡五、徐迅雷、戴望舒、程少怀、陈正道、沈起予、顾凤城、侍桁、杜衡、姚蓬子、叶灵凤等四十余人,他们都算做左联的发起人。那天,李初梨路遇朱镜我,镜我拉他去开会,李初梨也会

了,但他并非左联成员,他从事的是“实际工作”。

成立大会首先推定鲁迅、夏衍、阿英三人组成主席团,接着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,郑伯奇对左联《纲领》作了说明,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,而后是鲁迅、彭康、田汉、华汉相继演说。鲁迅的即席讲话当时会场无记录,画室(冯雪峰)根据回忆,又加上一些先生平时反复讲述过的重要思想,整理成一篇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,鲁迅审阅、修改后,刊登在4月1日《萌芽月刊》第1卷第4期上,署鲁迅讲,王黎民记。全文是:
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

——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——

(一九三〇年)

有许多事情,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,我不必再说。我以为在现在,“左翼”作家是很容易成为“右翼”作家的。为什么呢?第一,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,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,研究问题,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,“左”,都是容易办到的;然而一碰到实际,便即刻要撞碎了。关在房子里,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,然而也最容易“右倾”。西洋的叫做“Salon的社会主义者”,便是指这而言。“Salon”是客厅的意思,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,高雅得很,漂亮得很,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。这种社会主义者,毫不足靠。并且在现在,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,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,应该被虐杀、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,是差不多没有了,除非墨索里尼,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。(当然,这样的作家,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,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,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。)

第二,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,也容易变成“右翼”。革命是痛苦,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,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,那般完美;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,需要各种卑贱的,麻烦的工作,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;革命当然有破坏,然而更需要建设,破坏是痛快的,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。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

漫谛克的幻想的人，一和革命接近，一到革命进行，便容易失望。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，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，当时他叫道：“万岁，天上和地上的革命！”又说：“我是一个布尔塞维了！”然而一到革命后，实际上的情形，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，终于失望，颓废。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，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。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，也都是例子。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，那时有许多文人，例如属于“南社”的人们，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，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，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，便一切都恢复了“汉官威仪”，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，峨冠博带，大步地在街上走。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，民国成立，情形却全不同，所以他们便失望，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。但是，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，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。

还有，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，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，也是不正确的观念。举例说，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，而上帝最公平，诗人在死后，便到上帝那里去，围着上帝坐着，上帝请他吃糖果。在现在，上帝请吃糖果的事，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，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，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，将来革命成功，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，特别优待，请他坐特等车，吃特等饭，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，说：“我们的诗人，请用吧！”这也是不正确的；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，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，不但没有牛油面包，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，俄国革命后一二年情形便是例子。如果不明白这情形，也容易变成“右翼”。事实上，劳动者大众，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“有出息”者，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，如我所译的《溃灭》中的美谛克（知识阶级出身），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。不待说，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，不应特别看轻，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。

现在，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。

第一，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，必须坚决，持久不断，而且注重实力。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，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。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，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。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，却每次都是新的

敌不过旧的，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，要求很小，容易满足。譬如白话文运动，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，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，给他一点可怜地位，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，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，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，并不可怕，所以就让它存在，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，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。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，也差不多一样，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，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，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，拿去做装饰，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瓷器以外，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，也很别致；而无产文学者呢，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，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，不必再斗争，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：“无产文学胜利！”但除了个人的胜利，即以无产文学而论，究竟胜利了多少？况且无产文学，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，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，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，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，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，回到旧社会去罢了。

第二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。在前年和去年，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，但那范围实在太小，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，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，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。

第三，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。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，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，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，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，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。一个人做事不专，这样弄一点，那样弄一点，既要翻译，又要做小说，还要做批评，并且也要做诗，这怎么弄得好呢？这都是因为人太少的缘故，如果人多了，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，创作的可以专创作，批评的专批评；对敌人应战，也军势雄厚，容易克服。关于这点，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。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，那力量实在单薄，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，没有意思反攻了，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“空城计”。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，不务于招兵练将的；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，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，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。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

人来狙击我的，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。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，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，不过效果也很小。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。

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，但同时，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“韧”。所谓韧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“敲门砖”似的办法。前清的八股文，原是“进学”做官的工具，只要能做“起承转合”，借以进了“秀才举人”，便可丢掉八股文，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，所以叫做“敲门砖”，犹之用一块砖敲门，门一敲进，砖就可抛弃了，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。这种办法，直到现在，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，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，他们便永远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呢？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两本书，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，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，功成名遂，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，所以永远不见了。这样，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，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，因为这于我们有用。（卢那卡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，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，在经济上有帮助。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，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。）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，则非韧不可。

最后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。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，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！”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，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，所以行动就一致，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。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，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，或者只为了小团体，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，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，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。

大会通过了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左联《理论纲领》及《行动纲领》要点；成立常务委员会，领导日常工作、开展重要活动；一致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、国际联络研究会、文艺大众化研究会、漫画研究会四个研究会；创办联盟机关刊《世界文化》；与各革命团体建立密切联系；与国际左翼文艺组织建立密切联系；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；计划

出版多种左翼刊物,开展宣传鼓动;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;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提案。选举夏衍、冯乃超、阿英、鲁迅、田汉、郑伯奇、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,周全平、蒋光慈为候补委员。

左联内部设有党团(即后来的党委),冯乃超为首任左联党团书记。在职时间为1930年3月至同年下半年;此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还有:

华汉,1930年下半年—1931年2月;

画室,1931年2月—1932年3月;

钱杏邨,1932年4月—1932年5月;

耶林,1932年6月—1932年冬;

丁玲,1932年冬—1933年5月14日;

周扬(周起应),1933年5月15日—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。

左联设有秘书处,受常委会领导,由书记一人,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各一人组成,贯彻执行上级组织(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常委会)交付的各项任务,如发动盟员参加社会政治活动、从事创作、开展工作竞赛等,出版内部刊物《秘书处消息》,指导工作,交流信息。王宏志《左联的组织与结构》一文(收入《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:鲁迅与左联》书中)归纳了有关材料,在左联秘书处工作过的人员有:周全平、茅盾、沙汀、胡风、任白戈、徐懋庸,曾分别担任过书记;周扬、森堡(任钧)、周文、王尧山、何家槐,曾分别担任过组织委员,楼适夷、任白戈、杨潮、徐懋庸、夏征农、王淑明、林淡秋、梅益,曾分别担任过宣传委员。

左联成立后,曾在上海浙江北路牛庄路浙宁大楼设立秘密办公处,秘书处在此办公,开碰头会,会见左联内部人员等,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潘汉年安排的两位青年盟员,先是丁锐爪,后是唐瑜,他们住机关,兼管安全保卫工作。秘密办公处旁边是戏院,进出人员复杂,不久因不安全遂撤销,前后仅存在两三个月时间。

左联成立时,在秘书处下设文艺大众化研究会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、国际联络研究会、漫画研究会(研究会又称委员会);后根据实际需要,又增设创作批评委员会(简称创委)、小说研究委员会(又称小说研究会、小说组或小说散文组)、诗歌研究委员会(又称诗歌创作委员会、诗歌组)。

文艺大众化委员会,简称众委,成员有吴奚如、徐平羽、何家槐、陈大戈、彭柏山等,吴奚如、徐平羽、何家槐先后担任过召集人。众委的任务是“研究大众文艺的一切实际问题”,组织、指导盟员创作大众文艺作品,批判反动的大众文艺,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,从工人、农民、士兵中发现文艺人才,培养文艺作家。

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,成员有韩起、聂绀弩、周立波、徐懋庸、任白戈等。1931年8月,丙申(茅盾)曾向该会提交论文《“五四”运动的检讨》,载《文学导报》第1卷第2期,这是仅见的一次理论研究活动,我们没有发现别的史料。

国际联络研究会,简称联委,成员有夏衍、冯雪峰等,任务是向国外宣传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成绩,推荐中国革命文艺作品,指导翻译世界各国普罗文学,介绍国外信息等。

创作批评委员会,又称创作委员会、创作研究会,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上决定设立,成员有沈起予、金奎光、汪金丁、鲁迅、茅盾、周扬、胡风、任钧、沙汀、杨骚、叶紫、何家槐、艾芜、欧阳山、吴奚如等,主要领导盟员开展文学创作,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。

小说研究委员会,成员有沙汀、艾芜、草明、杨骚、叶紫、何家槐、聂绀弩、杨潮、周而复、杨刚等,负责人欧阳山,主要开展创作活动,促进左翼文学运动的繁荣发展。1936年10月15日,虽然左联早已自动解散,但小说组的人员仍在,他们创办了《小说家》杂志,举行作品座谈会,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学习鲁迅的小说。在悼念鲁迅逝世的日子里,他们学习鲁迅《祝福》《在酒楼上》《故事新编》等作品,东平还在该刊第2期上发表了《〈故事新编〉读后感》。

诗歌研究委员会,成员有蒲风、杨骚、关露、柳倩、白曙等,负责人穆木天、任钧,主要领导所属中国诗歌会创作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诗歌作品,曾出版《新诗歌》多期,发表通俗化诗歌一批,很有影响。

左联上海总盟的成员有:鲁迅、潘汉年、瞿秋白、茅盾、郁达夫、冯雪峰、丁玲、夏衍、周扬、田汉、洪深、华汉、耶林、冯乃超、丁锐爪、马子华、马宁、巴夫、王一榴、王任叔、王尧山、王洁予、王若望、王淑明、王蕾嘉、王学文、王尘无、方之中、方土人、方光焘、尹庚、艾芜、石凌鹤、甘迈、叶以群、叶紫、叶灵凤、田间、白薇、白曙、司徒慧敏、司马文森、冯宪章、冯

润璋、冯铿、朱镜我、任白戈、任钧、刘锡五、刘芳松、刘雪苇、刘宗璜、齐速、庄启东、安娥、关露、袁殊、许幸之、许峨、孙石灵、孙慎、卢芳、杜君慧、杜谈、杜衡、向思赓、罗烽、舒群、杨邨人、杨刚、杨潮、杨骚、李伟森、李辉英、李岫石、苏灵扬、吴强、吴翼如、吴振刚、何畏、何家槐、丘东平、邱韵铎、应修人、辛劳、汪崙、汪金丁、沙汀、叶沉、沈起予、张天翼、陈大戈、陈正道、陈企霞、陈荒煤、陈君冶、陈克寒、巫省三、林伯修、林淡秋、欧阳山、欧查、周全平、周文、周立波、周而复、周钢鸣、周毓英、周伯勋、郑伯奇、郑育之、孟超、孟昌、柳倩、胡也频、胡风、胡依凡、草明、柔石、洪灵菲、洪道、俞怀、姚蓬子、丽尼、聂绀弩、夏征农、徐步、徐平羽、徐迅雷、徐懋庸、殷夫、唐瑜、高云览、宣侠父、梅志、梅益、陶晶孙、萧三、黄素、黄新波、龚冰庐、祝秀侠、侯枫、韩起、韩侍桁、韩劲风、彭柏山、彭康、彭家煌、彭慧、蒋光慈、蒋弼、程少怀、楼适夷、童长荣、蒲风、雷溅波、廖沫沙、钟望阳、饶彰风、俯拾、钱亦石、葛琴、龚川琦、董绍明、董每戡、董曼尼、穆木天、戴平万、戴望舒、魏金枝等人。

为纯洁左翼文学队伍，1931年5月5日《文学导报》第1卷第2期发布《开除周全平、叶灵凤、周毓英的通告》，严正指出周全平、叶灵凤、周毓英背叛左联的事实，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左联。

三

北平的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学青年，听说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备受鼓舞。当时在大学任教的孙席珍，早已与文学结缘的潘漠华、刘尊棋、杨刚，“中国第一女兵”谢冰莹，从山东来到北平的李俊民，纷纷奔走相告、相互串联，大家都愿跟随上海左翼作家之后，组织起来，开展较大规模的左翼文学活动。这时，上海地下党文委也派遣段雪笙、郑吟涛前往北平进行宣传发动。北平文艺界立即团结起来共同行动，根据上级指令，经多日座谈协商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终于在1930年9月8日正式成立，公开发表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》和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理论纲领》。

关于领导班子，资料记载多有不同。据孙席珍回忆，成立大会推选潘漠华、台静农、刘尊棋、杨刚、孙席珍五人为常委，孙席珍为书记。据杨

纤如回忆，成立大会选举段雪笙、潘漠华、张璋、梁冰、刘尊棋、谢冰莹、郑吟涛、张郁棠、杨子戒、陈璧如等十一人为执委。据陈沂回忆，执委会由四名执委和一名候补执委组成：党团书记潘漠华，组织部长冯毅之，宣传部长杨刚，组织部干事陈沂，还有刘尊棋。左联北方部除上述成员外，还有于伶、马加、马纪纲、王志之、王余杞、王冶秋、王西彦、王瑶、王玉堂、王景任、方殷、方纪、公木、石啸冲、冯契、师田手、伍石夫、齐同、刘春、刘御、刘昭、刘景明、杨秀怡、李之珪、李长路、李绍庚、李蕤、余修、何菲、邹恩洵、谷牧、谷景生、谷万川、张秀中、张秀岩、张文松、陆万美、罗竹风、陈落、陈乃昌、陈北鸥、金奎光、金湛然、金肇野、周永言、周小舟、赵德尊、赵俪生、郝冠英、柳风、段英、俞竹舟、秦川、倪素存、徐突微、高敏夫、郭达、萧秉钧、韩白罗、程应镠、路一、碧野、端木蕻良、潘应人、潘丙心等，综合各种资料，约有一百四十人。

1930年12月，在地下党领导下，天津也成立了左联。天津左联由吴砚农等同志发起组建，成员有顾湘（顾柏苓）、王士钟、王士钧、张香山、曹世瑛、刘静、连志仪、高文通、顾文玲、邢继远、孙瑛、王学敬、李若文等，大多为进步文学青年。当时南开大学、北洋大学、河北工学院、法商学院、南开中学、中日中学、河北女子师范学校、三八女子中学等校大多设有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。

在河北省省会保定，1930年底也出现了左联组织。它是在中共保定特委领导下秘密成立的，由左联北方部盟员徐盈、张寒晖、梁冰等协助组织；1931年，左联北方部盟员周永言在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，又发展了许多盟员，有杨鹤声、刘光宗、刘秉彦、臧伯平、边隆基、陈锡周、曹庸民、牛心田、韩嘉文、臧金钊、王仁俊、刘鸿宾、郝品芬、臧健秋、王慕桓、张树森、赵克咏、王冀农、陈建民、郭廷芳、胡志平等人，负责人杨春圃。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育德中学的左联小组是保定左联的主力，第二师范学校左联小组领导人是周永言，育德中学左联小组领导人是刘秉彦。

受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和左联北方部成立的鼓舞，在青岛市地下党秘密领导下，1932年初，青岛大学部分进步学生也成立了秘密的左联小组，但对外界则称为“文学研究会”，由爱好文学的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林（原名王弢）领导，主要从事学生运动，半年后受到